

人与岁月



粒珍珠 的故事

刘德伟 著

一位世纪女性
的一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
与
岁
月

一粒珍珠的故事

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刘德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8123-3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刘德伟—回忆录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3633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杜 丽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123-3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序

林 达

我喜欢刘德伟的长篇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

读书的时候，面前仿佛总是站着那个有着男孩名字的爽爽朗朗的女孩。你明明知道作者是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可翻开书卷，青春气息却扑面而来。她总是年青的，书也年青。我已经不太相信“文如其人”的老话，写文章写书，很容易在写作时飞翔在自身现实之上，进入特殊状态，就好比演员并非剧中人。你在生活中无法企及的高度，在论述中可以轻易达到，可以在书里对别人循循善诱的道理，在生活中自己常常无力遵循。最容易的莫过于在书中挺起身板，就像最容易演的角色当是革命英雄，哪怕出演“慷慨赴死”时心中充满真实的悲壮，却毕竟晓得，应地倒下时并不会当真。我有时也会有忍不住要写的冲动，就不得不常常提醒自己这个道理。依我的经验，难以伪装的，是自然随和的幽默自嘲和轻松平实的叙述。前者有点先天遗传的味道，要学也难，后者要点修养，一时半会儿的可能还急修不得。刘德伟写自己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风格。你可以一点不费力气，顺着那条小径，轻轻松松读下去。

我还喜欢这本书的装帧和编辑方式，跟书的内容风格默契。封面左侧上方，浅浅细引了正文小小的片断，真是佩服编辑的眼光，看似随意牵

出的几句，就像是寥寥数笔勾画的素描，一下就给人物、也给她生长的时代，传了神：

我是个坏姑娘，狡猾又暴躁……

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一个佣人称呼我“大小姐”。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就大声喊着说：“叫她三少爷！”从那时起，我就是三少爷，打扮成男孩子……

当哥哥们和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请了一个南拳派的武术教师教我们拳术，母亲不同意我参加。她说：“女孩子学了拳术有什么用？”父亲以他一贯的幽默说：“哦，非常必要！当她丈夫不听话的时候，她可以一脚把他踢到大门外。……”

在书店里遇到这样一本书，只要拿起来，像我这样有好奇心的读者，一定不肯再放回店里的书架去。

刘德伟的故事还留给我们许多掩卷思考的空间。这本回忆录的时间跨度是从1912年到2004年，大家都知道，故事经历的时代并不轻松。她的人生故事就折射了许多有意思的社会历史。例如在1920年代中后期，大家读历史都知道，中国的左右两翼曾经合作又分裂。可是，我们却并不知道，在和百姓有关的具体政策中，左右两翼究竟有哪些不同，这些分歧在怎样具体影响人们的生活。刘德伟当时正在武汉读初中二年级，那里的教育先是左翼执掌，后又归属右翼。她以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左翼与右翼在教育上的分歧。刘德伟也见证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对立双方的权力转换不能通过正常政治程序，而要导致火拼和屠杀，司法缺席又如何殃及无辜青年学生。

从刘德伟的高中、大学的经历，我们看到那一代知识人的修养从哪里

来。青年学子生活在一个对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的环境中。刘德伟的父母信仰佛教，也给了她中国文化中优秀厚实的一份传承，她又在高中的教会学校接触了基督教文化，在燕京大学得到世界一流教授的教育。青年学生有可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和不同思潮，因而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们今天在讨论如何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办法，而早在那个时候，中国大学的质量就在自然推进提高。将近八十年前，美国所有的州就都有学生来燕京大学留学。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提高教育水平的路径，而是后来在道路堵塞之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扫清障碍。

刘德伟回忆录还有它特殊的历史价值。1938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刘德伟是十六名代表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从代表推选，可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的一个侧面。大会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代表，所有代表都由蓬蓬勃勃发展中的民间团体产生。刘德伟因此走遍美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在刘德伟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她是第一次出国，却以流利的英语，自信自尊的态度，轻易跨越观念和交流上的障碍和隔阂，使自己的抗日演讲大获成功。

刘德伟与恋爱多年、正在美国读博士的男友相聚成婚，留在那里读完社会学的课程，取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通过她的故事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福利工作，不只是简单意义的慈善，还牵涉一系列学科的专业知识，如心理学、法律、社会学等等。刘德伟就读的芝加哥大学，还强调专业知识和实践的结合。

刘德伟让今天的读者看到，在社会工作领域，不能忽略专业知识、专业精神，甚至不能忽略社会工作者自己的健全心智，否则会对工作带来伤害，因为需要受助的弱者、儿童，通常是本身就是有很多问题的一族。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理念的偏差可能更为致命。刘德伟适合这个工作，她是一个身心健康而平衡的人，社会关怀只是她对家庭关爱的自然衍生。

她曾经满腔热忱地投入1949年以后上海对流浪儿童的收容工作。对于刘德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来说，这是对人的关怀，是对一个个不同问题的儿童本身的救助。

可惜当时主导这项工作的理念，焦点却落在社会秩序整顿，而这些“问题儿童”的个人利益是可能被牺牲的。我们都知道，这种偏差，一差就差了几十年。现代社会福利的许多成熟理论，由于相关学科几十年的中断，至今在中国还不能完全轮廓清楚。直到今天，对刘德伟讲述的社会救助领域的许多基本概念，正在领导这些工作的官员仍然还相当陌生。

大时代动荡中，个人命运往往只是一叶随风飘荡的小舟。可是，刘德伟从父辈开始，就不是随波逐流的性格，两代人都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都奉行要对社会有所为的信念，因此，刘德伟总是在鼎力划动她的生命小舟。刘德伟出生在辛亥革命第二年。正当壮年的刘德伟的父母，跨越了一次辛亥革命，而刘德伟和他的丈夫，也在差不多的年纪，跨越了1949年的中国革命。从两代人跨越革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差别。他们的经历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对旧制度不满而对变革充满憧憬。刘德伟的父亲是晚清官员，她的父母积极参与了当时同盟会在酝酿中的变革。在辛亥革命之后，新政府沿用大批有新思想的清朝官员，刘德伟的父母毫无困难地就跨越时代变革，继续他们的社会服务。可是，刘德伟和他的丈夫向景云，同为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专业知识人员，而并非旧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却在无尽的政治猜疑中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留下几十年的专业空白。她对自己的种种遭遇都轻描淡写，我们还是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境遇，才会令一个天性开朗快乐的母亲和妻子，一个渴望对社会有所奉献的新女性，曾经生生往自己肚子里吞下一堆碎玻璃，塞下铁锯条，试图自行离开这个世界。

当国家开始醒悟和改变，刘德伟早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很难想



象，她此后还能够为社会做出那么多的事情，读来令我们对人生苦短的喟叹感到难为情。将近九十岁的时候，刘德伟用英语写下这本回忆，她仍像当年那个顽皮女孩，站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心灵净地，她感谢父亲母亲、教父教母和老师的教育，后悔此生没有给自己的家人更多关爱，感念家人对自己的爱和支持，遗憾自己没有做好对“问题行为”儿童的研究，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我读完这本书，却已经难以分辨：是刘德伟天生的反省能力使得上帝向她走近；还是以提升灵魂为目标的信仰，给她一生带来内省的习惯。这是一种很困难的平衡，严格内省通常会导致对自己过于苛严，也就抹去了有趣的鲜明个性；个性的张扬却又可能使得一个人自我膨胀而失去反省能力。我不知道刘德伟是如何做到在我看来是很难的事情，就是她几乎总是能达到内在的恰当平衡。这种平衡使得她叙述的故事不失活泼有趣，异乎众人，又在不经意间，能够令读者深受启发。她讲述的不是“理论”这样的艰深道理，而是一个智慧老人走过一个世纪之后的常识收获。就像她的英语名字，珍珠，在阳光下，闪着那一点点纯净的光。

她最后总结自己的人生，很是简单：每个人都有优点，向他学习。不计较他人负我，只求我不负他人，就可以觉得自己“干干净净、快快乐乐”。读她的书，随着她走过九十年里程之后，突然领悟，刘德伟看似简单、却很难实践的这一点人生真经，也是支撑着她一路走来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净化你自己的灵魂，不要旁顾，别人的灵魂，那是上帝的事情。

这本自传是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的。

从幼年时起，我就一直受着母亲刘郭文昭的教育。她教育我要成为一个能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人，使生命有意义。无论我是在快乐或忧愁、舒适或困难中，无论生命里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应该把它当成是铸成我人格和意志的锻炼。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她的话给了我充实地生活的动力。

我的父亲叫刘建民，是他教我认识了什么是民主。他告诉我，要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民主时代的公民，而不是封建政治制度的奴隶。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儿童时代	1
第二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17
第三章 难忘的燕京岁月	31
第四章 毕业了	73
第五章 赴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	81
第六章 美国之旅	97
第七章 旅行演讲大获成功	115
第八章 在芝加哥大学深造	125
第九章 香港遇险	141
第十章 在重庆和成都	153
第十一章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	164
第十二章 新中国的黎明	177
第十三章 参加上海市政府	191
第十四章 在上海的社会救济工作	201
第十五章 风乍起	211
第十六章 我成了“右派分子”	215
第十七章 欺骗的游戏	224

第十八章	回家啦！	238
第十九章	“文革”劫难	246
第二十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	259
第二十一章	最后相聚的时光	276

第一章 我的儿童时代

我是个坏姑娘，狡猾又暴躁。我生于公元1912年1月3日。那时，孙中山博士领导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对女人的压迫。我的父母都相信男女平等，他们都强烈地相信这个观念。平常一个女人的名字，多半是“花、玉、美丽”等等。但是，我一生下来，父亲就给我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德伟。我母亲写了一首长诗，在诗中，她希望有一天我能为中国做出伟大的事业。

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一个佣人称呼我“大小姐”。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就大声喊着说：“叫她三少爷！”从那时起，我就是“三少爷”，打扮成男孩子。

因为父亲宠爱我胜过我的两个哥哥，我就变得傲慢，并且欺侮两个哥哥。我的大哥比我大五岁，我不敢打他，但是我经常做一些使他不愉快的事情，使我自己觉得比他高傲。母亲总是叫他让着我。她说：“一个女孩子只是一位客人，‘女长一十八，铜锣一响别人家’，她在这个家庭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有一天，大哥忍无可忍，对我无可奈何，他以天真的儿童的表情说：“妈，别的客人都很懂得礼貌和客气，为什么我这个妹妹客人总是这么不客气。”

至于我的二哥，我总是对他恶作剧，我不怕与他打架，因为他只比我

大一岁。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没有大人在我们身边，我就把他推到门后面抵在墙上，一只手用门压着他，另一只手去捶打他的肩膀。我明知我的姑姑在洗澡，不能出来，却大声鬼喊：“你们来看，二哥在打我。”姑姑心知肚明，是我在欺侮我的二哥，知道我是个惹祸者，而二哥是个好孩子，就在洗澡间里大声喝叫他：“好孩子，你打回去，不要害怕。”但是二哥天性温和，从来不打我。

当我们都是十几岁的时候，二哥在数学方面的成绩特别优异，我在这方面就特别差，常常在期末考试中数学不及格，而必须在下学期开学前补考，如果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所以，在寒暑假中，我不得不温习数学。

当二哥辅导我时，他总是很耐心。有的时候，我不听他讲课，玩一些小东西。有一次，我的动作使他太生气了，他罢课！我就赶快冲到母亲面前说：“妈妈您看，二哥太坏了，他是在糟踏您的钱，他太懒了，他不愿意教我了，他要玩！”其实，我二哥对所有的弟弟和妹妹，都是慈如母，在辅导我们的功课与作业时，又都是严如父。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包括我这个“坏蛋”，都是终身敬爱他的。

父亲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他的经济力量不够，因为他已经把大部分的钱用来培养他年轻的弟弟和妹妹们上学。我的叔父主动拿出钱来支持我大哥和二哥去读名牌大学（同济与清华），一个学医，一个学土木工程。我这位叔父曾经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过抨击文章，反对他称帝，结果遭到通缉，要捉起来杀头。是我母亲拿出了她陪嫁的八十片金叶，资助了我叔父，让他连夜逃出关外，去了东三省避难（后来在那边成家立业了），才算躲过了死刑。所以，后来叔父资助大哥二哥去读大学，可以说是对我母亲的报答。

我们几个弟妹们，通过了高考，也都进入了名牌大学。二哥刚刚从清华毕业，就承担了三妹（刘德傅）在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读书的全部学费。

大哥从同济毕业后，也资助三弟（刘笃）读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我是靠武汉圣公会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读完了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二哥当时还资助了一位我们的堂妹（刘德秀）和一位我们的堂弟（刘德馨，他是一个孤儿），分别完成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这是我的父母亲以他们自己的行为作为榜样，对我们这些子女们爱的教育的结果。母亲说过，无论是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或堂兄弟、表兄弟，都要一样地以爱相待，彼此互助互爱。

我五岁进了家庭的私塾。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我不要母亲送我上私塾，而是独自一人穿过了一条黑暗的小巷，走进了学校。自己介绍了自己，非常大方自信地走到了孔夫子的像前，三跪九叩首，又转向先生，向他叩头。

这个时候，私塾先生向我出题进行考试。他出“红花”，我马上对“绿叶”；他又说“高山”，我马上对“流水”；他又说“美女”，我又对“英雄”；他又出“暮鼓”，我对“晨钟”。对完以后，先生非常高兴。他问我这些是从哪里学的，我告诉他，是从我母亲讲的故事中学来的。他以为我很聪明，但是不久他就失望了。

一天下午放学了，我和哥哥们吵了一架，之后，气冲冲



这是我父亲刘健民五十余岁所摄，当时他任国民党第10军少将军法处长。

地冲到教室里去，为了泄愤，我用剪刀，剪去了两个哥哥写字用的毛笔尖，把它们丢在地下。我的这些行为都被先生看在了眼里。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当年，他穿着蓝色的长袍，腰系黄色的宽腰带，腰带上还挂着烟袋与他的眼镜盒。他分明看到了我这些泄愤的行为，但他却并不制止，只是一边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一边摇头，一边在嘴里念叨：“泼妇呀泼妇呀。泼妇之婆，害群之马。”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瞧不起他了，觉得他是一个无用的老头。我就继续剪去所有毛笔的笔尖，泄我心头的恶气。

我最初读的书叫《三字经》，它是用三个字一句写成的书。它是每一个启蒙的学生都必须读的，包括天文、地理、人伦、哲学、历史等等内容。每天早晨先生教几句，我就要立即背得出；下午要学写大楷、小楷，晚上要背诵古诗。

在那些日子里，学生们都要用一种单纯的音调去背诵课文，所以教室里充满了单纯得像唱歌一般的声音。我也跟着他们背诵，但是我背诵的不是课文，而是随心所欲的遐想。我二哥和我坐在同一张方桌的同一个犄角的相邻的座位上。我在桌子底下，抓住他的一根手指，一边用一块竹片来回地锯他的手指，一边口里用背诵课文的音调唱着：“杀猪！杀猪！”不料，他一会儿就大哭起来，原来他的手指已被割破，流出了鲜血。

我看见了血，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心想，千计万计，走为上计。我想躲到父亲衙门旁一座荒芜的园子那里去。我站起来，向着教室的边门跑去。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叔叔（我父亲的三弟）的书桌正在那个边门的旁边。他一贯站在我哥哥们的一边，最恨我。他从后面一把就抓住我的衣服，提了起来，我的手脚在空中乱舞，就像渔夫抓了只螃蟹。他把我从教室里拉出来，扔到我母亲卧房的床上，把我押到我母亲面前，说：“嫂子，你揍她一顿！”我趴在床上回头一看，母亲正在寻找她平时体罚孩子用的一块木板。我当时想还是“逃为上计”，就溜下床来，向门口冲去，又一次



被把着门的叔叔捉住。他抓住我的辫子，又把我扔在了床上。我挨了母亲的一次狠打，她打我的屁股。我受到这次惩罚，使全家人从心里感到痛快，除了父亲。

母亲开始看出进行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教育我们这些孩子。她讲的故事都是关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的，他们的伟大是基于从幼年时开始的对人格的培养。每天晚上，诗词课的练习与写日记是饭后的课程。先生认为，诗词与齐家治国无关，没有经典的沉重，是轻松的，它的美感与音乐感是与黄昏的那种美感融在一起的。所以，他把诗词课的练习放在晚饭后，一直上到晚上8点。

每当我想到母亲讲故事，两个熟悉的能带给我心灵一种甜蜜而温馨的情景，立即浮现在我的记忆中：一个是夏日的晚上，一个是冬天的夜晚。

夏日的晚上，一个大宅门的天井出现在我的幻觉之中。这个天井是用白色的石板铺起来的，走廊围在它的周围。天井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大缸，缸体布满美丽的雕塑，缸内有红色的金鱼在绿色的水草中游动。很多很美丽的花盆安排在缸的周围，它们又美又香，而且各种颜色都有。晚风轻轻地把香气吹送到在天井中乘凉的人们的身上。走廊的尽头是母亲喜欢的地方，它通向亲戚们住的另一处房屋与天井。那里的穿堂风非常凉快。她时常坐在一张竹制的躺椅上，让风吹散她乌黑发亮的头发。在月光下，她显得非常美。每当风停下来时，她就用一把很大的蒲扇，去扇自己的头发。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围着她，求她讲故事。

冬天夜晚的情景完全不同。那是在室内。房门口挂着很厚的棉帘，帘子上的刺绣辉煌而灿烂。在房屋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铜盆放在一个几乎贴着地面的雕刻精美的木架上面，里面烧着一盆通红的炭火。离那盆火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围着母亲听她讲故事的地方。她的声调，面部的表情，词汇的选择，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讲故事是她用来教育我们和塑造我们性